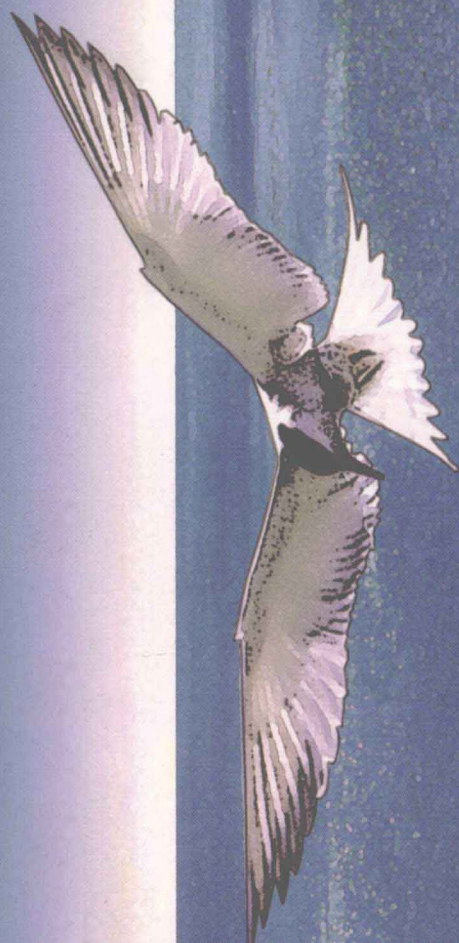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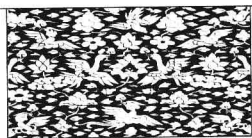




王夢鷗先生文集②





文藝美學

王夢鷗先生文集 ②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文藝美學／王夢鷗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臺北市：里仁，2010.08
面；公分。——（王夢鷗先生文集；2）
ISBN 978-986-6178-01-6（平裝）

870.1

99014425

· 本書經作者法定繼承人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文藝美學

王夢鷗先生文集②

編輯者：王夢鷗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
總策劃：林明德

校對人：張惠美·陳志源·鄭喬方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m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一〇年八月卅一日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 400 元

ISBN：978-986-6178-01-6（平裝）

自強不息的君子

——王夢鷗先生

林明德

一、生命情境

古今中外，一些豐美的人生實例顯示，一個人的生命歷程，無非是生命情境的追尋與完成；唯有透過此種肅穆又積極的經營，才能展現人生的全幅意義。

然而，生命情境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開放、有機的現象。由於造詣的深淺，而呈現寬窄高低等不同的層次。我們認為一種圓融的生命情境，是建立於

（一）道德事業

（二）學問事業

（三）情感事業

三者的依存與互動關係上。質言之，前兩者為德、術的修養，屬於知性範疇的擴充或提升；後者是情感境域的涵養，屬於感性的孕育與提煉。就生命的終極關懷而言，三者俱備，知感充實，「生命」得以圓熟，「人格」也因此開展。不過，能具有其中任何一者或二者，雖未能臻於通透、圓融之境，亦足以光彩生命，卓越人生了。

這裏特別要說明的是，「事業」一詞的本義乃：「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也就是指「一個人竭盡其努力，以貢獻於某一理想的實現。」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把道德、學問、情感視為事業，馴致生命情境的質素，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命題吧。

中國的學問一向重視人生哲學，以「生命」為主要前提，古聖先賢念念不忘以「德性」來潤澤潛化生命，企冀使「自然生命」經

由人文的洗禮、淨斂，轉向豐美的「道德生命」，此即所謂「尊德性」；同時，與「道問學」倚伏，相輔相成，從而成就圓熟的人格與自主的生命。

經驗告訴我們，道德無形無狀，但絪縕若存，能移質性，使人溫潤如玉；道德也能促成生命的自覺，透顯自律的人格。

一個以道德為事業的人，必然遙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的真諦，與時俱進，經之營之，以恢宏生命，包容萬物，進而發揮影響力，予人溫暖，感動其他生命。這種悲憫情懷，也就是《中庸》「成己成物」的實踐。

大致上說來，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都有「學不可以已」的自我惕勵，並且以「學問」為事業，透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識照，自能卓然成家，呈示圓融的文化智慧。

但是，學問事業貴在廣博，不能偏執或封閉，最理想的是，人文、社會、自然科學都能兼攝融會，以養成純正的趣味與智慧。如此，才能獲得生命的新能源，呈現活潑的生命力，與貫通古今中外的大氣概。

張潮云：「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幽夢影》）佛洛姆（E. Fromm）亦云：「愛，是社會和諧的泉源，也是人類生存問題的解答。」（《愛的藝術》）可見把情感當作事業，自有其嚴肅的意義在。在近代，梁啟超最能體會個中的奧妙，他以為「天下最神聖的莫過於情感」、「用情感來激發人，好像磁力吸鐵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鐵，絲毫容不得躲閃」，比之「用理解來引導人」，其效果真有霄壤之別。因此，情感可以說是「一種催眠術，是人類一切動作的原動力。」

情感固然是天下最神聖的，不過，其本身「是盲目的，到處亂碰亂迸，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所以古來大宗教家

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養，老實說，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揮，把那惡的醜的方面漸漸壓伏淘汰下去，這種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類一分的進步。」（以上引文俱見《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感情》）

感情的修養指向是高潔純摯，但它必須透過「向上提挈，向裏體驗」，才得以養成一己優美的情感，從而放出熱量，感染他人。在「情感」的滋潤下，人可能變得溫柔敦厚，浮現憐憫情懷，並藉以分享情感的溫馨，充實生命。

基本上，圓融的生命情境涵蓋道德、學問與情感，雖然三位一體，卻是倚伏互動，在自強不息的進程，呈現活潑的心靈、和諧的情調，與通透的生命。近代中國，臻於此等造詣的，不乏其人，這裏特以王夢鷗先生為例，透過學問事業的概述，以領略其生命情境。

二、學問事業

王夢鷗先生（1907～2002），福建長樂人。民國十五年，就讀福建學院。十九年，負笈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文研所研究。二十五年返國，二十九年任教於廈門大學。三十五年，任職中央研究院。三十八年隨中央研究院來臺。四十五年，任教政治大學中文系，六十八年榮退，有詩誌感云：

引年驚老大，涉世愧行能。

久作過江客，俄成退院僧。

有書祇覆瓿，何物與傳燈。

猶恃牛羊眼，窮參最下乘。

其情懷志趣，大概可見。然而，從此之後，批評、小說兼治，

散論、專著輩出，充分顯示其學術活力與文學智慧。

探索王先生的學問事業，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一是學問經驗，一是學問領域。

先談學問經驗

在王先生的學術世界裏，約可以分為日本經驗、歐美經驗與中國經驗。他早年留日，後來，或研究或講學，進出日本十餘次，對日本的漢學研究，知之甚詳；並且先後與漢學大師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池田末利、平岡武夫、御手洗勝等人切磋、溝通，一窺日本學派之優點——設計專題、精細考證、應用資訊，以增拓研究的視野（vision）。

對於歐美國學術，他特別留意美學、文學思潮與批評，以最落實的方式，由翻譯名篇入手，循序漸進，建構體系，然後累積成書，因此對原著的深層訊息，往往能有更多的同情與諒解。特別是歐美文學批評的分析哲學，更助長了他的洞見力（insight）。

然而，王先生的學問基礎，畢竟還是得之於中國經驗。他沉潛禮學、《文心雕龍》、唐人小說，兼攝儒釋道，苦心孤詣六十餘年，識照卓絕，成果斐然。從他的論著中可以看出驚人的、巧妙的運作能力，他融會日本漢學的視野與歐美國學術的觀點，造就了自己的文學智慧，也提供一個學術研究自主性的範例。

次談學問領域

王先生的學問事業六十多年，學域寬廣，著作豐碩，包括散論九十餘篇、專著三十種，就性質而言，可歸納為五類，茲略析於下：

（一）禮學研究

王先生的禮學研究，由來已久，自民國三十一年〈原禮〉刊出以來，將近五十年，其間散論十五篇，專著四種。在這些著述裏，他往往利用科學方法解釋古代經史，發明新義；加上曾在中央研究院，博覽珍藏的古今禮書與古代禮器，所以陳述皆為實證可信。

在〈禮記思想體系試探〉一文，他指出：「禮學分派，與其謂為有『今文學』與『古文學』之差別，毋寧謂之有『齊學』與『魯學』之異同，倘更按其實，與其謂有齊魯學之異同，不如逕稱之為鄒衍學派與荀卿學派的糾雜。」要言不煩，卻直截了當，令人耳目為之一新。尤其是，引鄒衍學說以詮釋《禮記·月令》的陰陽五行，解開謎底，真是大快人心。然而，也因此《鄒衍遺說考》得以完成，透過五德終始論、五時令與明堂、五帝德，與大九州說的探索，不僅補充先秦學術思想史的疏漏，也替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尋回一個被忽略二千多年的重要人物及其中心思想。

至於《禮記今註今譯》，深入淺出，是智慧觀照的結果。《禮記》向來古奧難讀，經由王先生的今註今譯，原意豁然開朗，文筆亦雄奇可喜，在禮學入門的參考書中備受肯定。

（二）《文心雕龍》研究

從民國五十七年起，王先生推出《文心雕龍》的散論系列，或〈宗經〉或〈辨騷〉或〈定勢〉，其焦點不外文心與論文的探討；七十年，《古典文學的奧秘——文心雕龍》可謂大功告成之作。他認為，劉勰正好生於中國文學轉變的高潮上，既能掌握周漢時代文藝的精神，又熟悉魏晉文章的動向。顯然，是劉氏披誦十代近二千年的文學作品而完成的文學概論；這書體大思精，分前後兩部分：

前一部分有文章本論五篇，文體分論二十篇；後一部分，論「文」之與「心」以及「雕龍之術」二十篇；餘論五篇，其篇名始於「原道」而終於「總術」，剖道析術，本末呼應；文心原於「道」而雕龍是其「術」，可見其巧思；加上使用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之例——以四十九篇論文，餘一篇「序志」，此種篇目設計，純粹出於中國的觀念。

是以，王先生認為：「這是一部中國人用中國的觀念及其思考方法寫成的文學論」。

《文心雕龍》雖僅有三萬七千餘字，然而語言駢儷，指向紛歧，視之可見，按之愈深，讀來頗不易；經過王先生系統的論述，精闢的分析，的確引人入勝。

（三）美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

基本上，美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三者是有分際的，其間也存在一些共同質性，倘若加以調適，倚伏運用，可收映襯參證、互相發明之效。這裏，所謂的美學、文學理論，中西兼顧；而文學批評，則以中國傳統為主。茲說明於下：

首先，簡述美學。

近代中國美學家，雖然不乏其人，但能夠融會中西美學，印證中國文學，以窺其奧秘，除朱光潛先生外，恐怕不多見。然而，王先生在這方面的獨特表現，是有目共睹的。民國四十二年，〈中國文學中的自然美〉，從文學作品去玩索、分析自然美，靈視巧妙，發人深省；〈中國審美思想窺源〉一文，在宏觀之中顯示一分思致，他言簡意賅的指出，儒家的典雅之審美觀，合美善為一，以道德為藝術；道家則崇尚自然美，否定藝術美的存在，以為自由、無限才是至善至美的境界。然而，兩者的審美目的似乎相反，適亦相

成，他們的精神透過歷代的作家作品，卻溶化為中國的藝術式樣。剋就事實，於是結論：「典雅似乎是我們正統的審美觀念，雖然其間還包含著很多道家的墨家的甚至佛教的精神在內。」

四十八年的《文藝技巧論》與六十年的《文藝美學》兩書，則是會通西方美學經典之後的一種中國論述，從其中，我們看到了學術的自主性。大致上說來，前者涉及文藝思潮、理論與技巧，王先生援引西方理論以印證中國名著，其動機無非想為中國現代文藝注入活力，馴致指出方向；後者包含兩篇，上述西洋文藝思潮，下論美學，分美的認識、適性論、意境論與神遊論，一路開展下來，美不勝收，至於語言之犀利、辯證之精采，適時例證中國文學，其用心不可不謂良苦。

其次，略述文學理論。

這方面，包括五十三年年的《文學概論》與六十五年的《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兩種，對台灣的文學研究一直有相當大的影響。

前者是一部文學入門，王先生開宗明義指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接著把語言的藝術活動區分為兩度事實，一是內在的構想，一為外在的構辭；並且認為文學作品所共有的特色乃在它們好像都是個廣義的「隱喻」。不過，他也強調被凝固為藝術品的那些語言，是決定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條件之下。

這部書分二十三章，約二十五萬字，涵蓋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範例則以中國為主。王先生曾說，劉勰《文心雕龍》是中國一千五百年前的《文學概論》，那麼，此一「很認真、有系統」的「現代綜合的考察」，恐怕不無為往聖繼絕學之意在。

後者為譯作，原書乃新批評的典範，二十多年以來，其觀點曾激盪臺灣的比較文學界。王先生積十年歲月譯完，立即引起中文學

界的注意，一時「外緣研究」與「內在研究」，蔚為風氣。

至於文學批評，包括散論三十六篇、專著兩種。從著作目錄可知，王先生對問題的提出與後續研究，是有規畫的：單篇論述，建構系統，從而呈現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規模。相形於郭紹虞、羅根澤、劉大杰等人的專著，他的造詣毋寧更具精心與氣勢。

七十三年年的《古典文學論探索》二十篇論文，探索自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宋千年之間的文學理論發展之過程，並且透過史的追蹤，精審的考據，解決了許多文學批評史上的關鍵問題，例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貴遊文學、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唐代新體詩、詩家夫子王昌齡、皎然《詩式》、白居易〈金針詩格〉，與嚴羽以禪喻詩等。

七十六年的《傳統文學論衡》二十二篇，延續並補充前書，其中漢魏六朝共六篇，極具分量。而〈魏晉南北朝文學之發展〉，蹊徑自闢，文學與文學批評交互運用，觀照適宜，史識卓絕，允為斷代文學史的範例。在十一篇唐代論述中，包含詩歌、小說，承續前書，以補不足，如果再配合「可拯千百之墜獻，並以補文學史之闕文」的《初唐詩學述考》，則唐代文學批評之藍圖，宛然在目。

（四）唐人小說研究

自魯迅開啟唐人小說研究風氣以來，經過陳寅恪、劉開榮、汪辟疆等人的努力，成果斐然，而唐人小說研究儼然是漢學新焦點。

王先生投入唐人小說研究三十年，面對浩瀚的筆記小說，苦心孤詣，往往超越前人藩籬，表現驚人的成績，《唐人小說研究》一～四集與《唐人小說校釋》（上、下），就是最好的見證。他諳熟歷史，精通考據，加以世事練達，人情透徹，面對專題，能在無疑處有疑，循序漸進，披露真相，因此，論著刊出，經常撼動學

界。例如，歷來學者對〈虬髯客〉作者莫不肯定為杜光庭，但他獨排眾見，根據晚唐蘇鶚《蘇氏演義》推論，斷定杜光庭值得商榷；再如〈崔鶯鶯的身世〉，固然是針對劉紹銘〈再讀鶯鶯傳〉一文而寫，卻在陳寅恪的基礎上，旁徵博引，一再追索，以求接近歷史的真相，讀來絕非泛泛之論，至於結語：「傳奇與述異、志怪同科，然則元稹之作此文，其動機或始於懺悔之心情而終結以遊戲的筆墨，後人必欲從中按問曲直是非，反而顯似癡人前說不得夢了。」理直氣婉，而入人意內。

其他，如〈沈既濟生平及其作品補敘〉、〈南柯太守傳及其作者〉，都可看出考據分析不外人情世故的體會與運用。在〈唐人小說概述〉一文，更可窺見他在這方面的圓熟之識見。他藉著四個子題來說明：（一）唐人「小說」的名稱問題，通過歷史探索，發現「唐人對自己作品的性質、名稱，都自己標出。並不是說寫一篇小說，或一篇傳奇，而是傳、記一類，非傳即記。這一點關係非常重大，因為它牽連到對於『唐人小說之淵源與流衍』的認識。換句話說，作傳作記，不只是名稱，而且使唐人作品具有它的特質。」

（二）唐人小說與六朝志怪：其差別乃在，六朝撰志怪只是筆記而已，唐人則是志怪加史筆再加詩歌，如此，小說不但有嚴肅的史筆，又貫穿詩人的情感，而形成一種異於志怪的特質。（三）唐人寫小說的動機：不外勸誡、志怪錄異，與作宣傳工具三種。（四）唐人小說與古文運動的關係：他一反古文運動（關鍵人物韓愈）與小說發展關係密切的說法，舉證韓愈與沈既濟的兒子（沈傳師）同輩，而沈氏當時已負盛名，所寫的是小說，而不是韓愈的古文。據此推論唐人小說與古文運動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密切，相當具有說服力。

《唐人小說校釋》統攝了王先生三十年的研究心得，是建立在

《唐人小說研究》一～四集的基礎上。不過，這也是他精心之作：篩選校釋、整理自己；精闢的詮釋，揭開了唐人小說世界的奧妙。

（五）其他

這部分，有小學、創作，與翻譯三類。

六十三年《漢簡文類編》，是王先生任職中央研究院，為探索《禮記》，參證漢簡文字的另一成果，充分透顯了獨特的辨析能力。出書以來，馳名中外。

創作方面，分戲劇與傳記，前者又以三幕劇為主，例如：《紅心草》、《生命之花》、《燕市風沙錄》，與《烏夜啼》。後者即《文天祥》一種。這些創作均完成於抗戰期間，對國民不無鼓舞作用，顯然是知識分子參與抗戰後援會的實際表現。

至於翻譯，分理論與創作兩種。前者即《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已見上述；後者有《冰島農夫》與《可審巴》，譯筆達雅，很受讀者的喜愛。

三、人境溫暖

橫看成嶺側成峯，王夢鷗先生給予人的印象，容或有所差別，但其中自有一分共識：人境溫暖。

在他的生命情境進程中，隨緣關懷後進，啟人智慧、導人理則、給人溫暖。然而，博學謙沖的他，面對問題時有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永遠要言不煩，讓對方有思考的空間，整理自己的問題。六十多年來，經他指點、激盪，而斐然成家，飲譽學界的，不在少數，例如：敦煌學專家羅宗濤教授、文藝思潮學者尉天驄教授、致力文學批評的黃景進教授、沉潛道教文學的李豐楙教授，與專攻子弟書的陳錦釗教授……等。

我個人親炙王先生三十餘年，獲益良多，深深感受到，他是位自強不息的君子；透過學問事業，我們認識了他圓融的生命情境。

最後，絕不能忽視的是，王夫人梁靜訓女士，她是湖南長沙人，蕙質蘭心，擅長英美文學，與先生結褵七十年，鸞鵲比翼，在人生路途上相扶持，為「生命共同體」作了最好的詮釋。

斟酌古今中外

——論王夢鷗先生《文藝美學》

林明德

一、前言

近代中國，有關美學的研究，蔚為風氣，頗有顯學趨勢。其間著作如林，人材輩出，但是學界公認能夠融會中西美學，印證中國文學，以窺其奧祕，除朱光潛先生外，恐怕不多見。

然而，個人覺得王夢鷗先生在這方面的獨特表現，是不容忽視的。長期以來，他在美學的領域所釋出的智慧，一直影響台灣的學術心靈，而《文藝美學》與《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識照卓絕，歷久彌新，更是有目共睹的。

二、王夢鷗及其《文藝美學》

王夢鷗先生（1907~2002），福建長樂人。一九二六年，就讀福建學院。一九三〇年，負笈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文研所研究。一九四〇年，任教廈門大學，一九四六年，任職中央研究院。一九四九年，隨中央研究院來台，一九五六年，任教政治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九年，榮退，獲聘為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講座。

王先生的學術世界，大概建構於日本經驗、歐美經驗與中國經驗。他對日本的漢學研究相當熟稔，先後與多位漢學大師切磋對話；於歐美文學特別留意美學，文學思潮與批評；在中國則沉潛禮學、《文心雕龍》、唐人小說，中國文學批評，兼攝儒釋道、斟酌雅俗之際，苦心孤詣七十年，成果斐然。他的學域寬廣，著作不斷，包括散論百篇、專著三十種。就性質而言可歸納為五類，即：

(一) 禮學研究、(二)《文心雕龍》研究、(三) 美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四) 唐人小說研究、(五) 小學、創作與翻譯。

(一) 美的歷程

王先生的美學歷程，從涉獵、投入到經營，除了個人的興趣外，也是他對文學研究的根本。

一九五三年，他發表〈中國文學中的自然美〉，從文學作品去玩索、分析自然美，靈視巧妙。〈中國審美思想窺源〉一文，在宏觀之中顯示一分思致，他揭示儒家的典雅之審美觀，合美善為一，以道德為藝術；道家則崇尚自然美，否定藝術美的存在，以為自由、無限才是至善至美的境界，然而，兩者的審美目的似乎相反，適亦相成，他們的精神透過歷代作家作品，卻溶化為中國的藝術式樣。他的結論是：「典雅似乎是我們正統的審美觀念，雖然其間還包含著很多道家的墨家的甚至佛教的精神在內。」

一九五九年，他出版《文藝技巧論》，涉及文藝思潮、理論與技巧，他援引西方理論以印證中國名著，為現代文藝注入活力，指出方向。一九七一年，他整合《文藝技巧論》推出《文藝美學》，在這裡，我們看到他會通西方美學經典後的一種新典範，學術自主的中國論述。

王先生的美學經驗涵蓋古今中外，美學歷程從散論到專著，用心經營，脈絡清楚。其著作的完成次序是：《文藝技巧論》（一九五九，重光文藝；一九八四，學英文化，增益兩篇改名《文藝論談》）、《文藝美學》（一九七一，新風；一九七六，遠行）、《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原名《文學概論》，一九六四，帕米爾；一九七六，藝文；一九九五，晚年自訂稿改為今名）。三書也

反映著王先生的心路歷程，顯然地，第三書是在前兩書的基礎上，轉化出來的結果，該書融會文學、美學、語言學與心理學的觀點，涵蓋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成就一家之言，是替中國文學理論尋找路向，也為讀者提供文學入門之鑰。

（二）《文藝美學》探索

《文藝美學》是尉天聰教授集結王先生早年散論而成的論著，包括上、下篇，共十一章，約十四萬字。上篇述西洋文藝思潮，下篇論美學，形式分篇，卻相輔相成，內聚文藝美學的視野與智慧。茲分別討論於下。

1. 上篇七章，約七萬多字。其中，二、三、四、五、七等五章，已收在《文藝技巧論》，但也經過王先生的修訂與擴充。

七章始卒若環，開始〈西洋的文學觀念〉為總論，最後〈二十世紀之文學批評〉為結論，中間概括五個專題，深論西洋文學流派。

王先生指出，西洋文學觀念的構成要素是由（一）希臘的傳統觀念、（二）羅馬精神、（三）基督教精神，外加（四）各個民族固有的特性交織而成的。顯然地，前三項是他們的共同性格，第四項為國民性的差異，使他們的文學多少也帶著自己的特色。

從近代文學發展上看，「文藝復興」不能不說是重要的轉捩點，其特質無非是希臘羅馬精神之再生，古希臘學統之重新接上時代，以及文明曙光——「人本主義」的浮現。這個運動由意大利半島影響到歐洲，各國相繼出現嶄新的文學作品，如法國的拉布雷，西班牙的賽萬提斯與英國的莎士比亞，從而締造各民族的文學特性，於是有英國文學、法國文學與德國文學之分；文學觀念越來越複雜，古典的、浪漫的、寫實的、自然的……相繼而起。